

ZHONGGUO LIBAI YANJIU

中国李白研究会 编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李白
研究所

中國李白研究

李白
題

2006~2007年集

黃山書社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刊
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中国李白研究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李白研究. 2006~2007/中国李白研究会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07. 7

ISBN 978-7-80707-744-2

I. 中… II. 中… III. ①李白(701~762)—人物研究
②李白(701~762)—唐诗—文学研究 IV.

K825. I6 207. 227. 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16044 号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嘉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主 编:薛天纬

副主编:李子龙(执行) 陶新民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友胜 朱玉麒 朱易安 李子龙 张瑞君

余恕诚 陶新民 殷春梅 阎 琦 葛景春

詹福瑞 蓝 旭 薛天纬

编 校:殷春梅

目 录

生命与生活之歌

- 解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薛天纬(1)
- 李白的文化人格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 康怀远(13)
- 略论李白文化的现代价值 ····· 蒋 志(26)
- 李白诗歌的征服精神 ····· 康怀远(45)
- 论李白在传统文化流程中的作用 ····· 崔际银(51)
- 李白诗歌名篇传播论略 ····· 崔际银(68)
- 论大唐盛世文化氛围对李白思想性格的
深刻影响 ····· 杨海波(84)
- 李白诗歌对湖湘地理环境特征的揭示 ····· 李德辉(99)
- 李白在马鞍山市境的诗文和意义····· 李子龙(107)

- 试论李白对曹植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 王 巍(120)
- 李白诗歌中的剑意象分析 ····· 陈 斐(130)
- 李杜绝句差异论····· 葛景春(145)
- 唐五代李白再塑论纲····· 何念龙(168)
- 刘熙载论李白绎说····· 胡可先(187)

王夫之论李白·····	邬国平(203)
宋代的李白研究简述·····	殷春梅(218)
建国以来李白研究述评·····	程宏亮(231)

一首被严重误读的诗篇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读·····	阮堂明(247)
《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裴长史疑析·····	武承权(260)
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 题壁》诗之写作年代及其离乡出蜀考·····	文幸福(268)
李白与孟浩然同游溧阳考辨·····	奚渭明(274)
李白研究史上的新发现·····	武承权(279)
李白诗中的夸张特色与数字美学·····	杨国娟(298)
李白诗中的四季·····	蓝旭(317)

俄罗斯的李白翻译与研究·····	冯欣(328)
李白古风吹莫城·····	理然(337)
中国李白网流量统计报告·····	吴坤地(341)
2005年李白论著目录·····	韦兰(351)
2006年李白论著目录·····	韦兰(368)

附 录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12次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杜和题(383)
在“李白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陈苏汉(385)
“李白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葛景春(388)

生命与生活之歌

——解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薛天纬

上世纪的 1940 年 8 月,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下简称“李著”)在长沙出版。^[1]最近读到一篇书评,^[2]知道“李著”的核心部分,即“导论”,事实上 1937 年就发表了,其时作者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只有 28 岁,且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样的年龄和身份,使得他能以纯真的心态和澎湃的激情来读李白的诗歌。在书序的开头,作者写道:“在我的心目中,李白是有一个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在那里的。把这一个活泼泼的影子写下来,就是这本小书。”书的部头确实不大,计算字数不超过 7 万。文字表达也不似今天的学术著作那样面孔俨然,而是以抒情性的、诗化的语言,直陈对李白诗歌和李白精神的感受。然而,这本著作对于李白其人生动而真实的再现,对于李白精神的深刻揭示和阐释,却给人留下过目难忘的印象,它以李白式的爽快语言所表达的独到见解,今天的研究者似也难以超越。^[3]

“导论”部分，作者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李白的本质：生命和生活”。这是作者对李白的看法，也是“李著”的精髓所在。生命和生活，说得具体一点，即人的基本生命需求和基本生活欲望，也就是人性、人的本性。将李白的本质锁定为生命和生活，实即从人性入手来解读李白。“李著”又说：李白“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李白属于王国维所谓“主观之诗人”一类，他的代表作均为主观抒情之作，这些抒情之作是他的生命和生活之歌，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张扬人性的最强音。



人性是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恒久不变的，是人人相通的。
“李著”说李白：

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

李长之的时代（即现代，包括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上距李白的时代过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指出：李白的人生、李白的悲喜与我们一般人“并没有太大的悬殊”（按，会有具体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的差异，但无关人性之根本），换句话说，李白的生命需求和基本生活欲望，和我们是一样的；就诗歌表达的人性而言，李白与千年之下的我们是相通的。但是，李白何以为李白？他与一般人在人性相通的前提下，又有什么特异之处呢？李长之说了这样几段话：

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

他比我们喜、喜的利（厉）害，悲、悲的利害，于是我们就

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

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这是因为他所爱，所憎，所求，所弃，所喜，所愁，皆趋于极端故。

像李白这样的诗人，早经有人说是疯子，或狂人了，……不过，疯子和狂人有没有价值呢？这在普通人偶尔一想，好象是没有的，其实，太不然了，我敢说任何人需要着疯子，狂人。我只揭穿一句话就够了，就是，疯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不过不肯说出来，不敢说出来，天天压抑着，委屈着罢了。却逢巧有人能替我们冲口说出来了，难道这不是人类的功臣吗？倘若更进一步，不但能替我们说出来，而且拣了那最要紧，最根本，最普遍的给道出来，而且再进一步，乃是把这最要紧，最根本，最普遍的要求，置之于最美妙的艺术形式之中，那末，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是功臣之功臣了！

这些话里包含了两层基本意思：

第一，李白的生命需求和生活欲望趋于极端，在质的方面和一般人一样，但在量的方面比一般人强大。我们普通人的生命需求和生活欲望比较现实、比较平凡甚至平庸，而李白的生命需求和生活欲望总是追求“理想化”和“最大化”，追求“顶极”。比如，人是社会的人，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发展欲望，即希图人生有所作为，希图尽可能地施展自己的智慧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在社会群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李白的时代，人生作为的第一要义，就是建功立业。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曾自我表白其功业目标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又以“陶朱”、“留侯”为榜样，即要做宰相、王者师一类人物。拟之现代，等于宣言自己将来要做国务

院总理。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也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这一点，李白和许多唐代著名诗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杜甫旅居长安十年，苦苦求官，后来朝廷让他做河西尉，他不做；改为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就接受了，写诗说：“不做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外县不去，只要在长安就行。与杜甫类似的是岑参，应进士试及第后，授官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品阶也是从八品下，内心虽然委屈、郁闷，但还是接受了，写诗说：“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初授官题高冠草堂》）李白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小官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他给自己树立的榜样，是“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的吕尚，是“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的鲁仲连，是“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的谢安。而其建功立业的方式，亦如吕尚，是“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如鲁仲连，是“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如谢安，是“一起振横流”、“谈笑安黎元”。都来得十分快捷，十分潇洒，即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云：“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当李白这样表达他宏伟不凡、甚至是举世无其匹的功业理想时，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纯然的抒情，他是很当真，也很自信的，所以，他留下的名言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于李白的功业理想，我们习惯于从诗人与社会、与国家、甚至与帝王的关系来认识，从而肯定他的政治热情、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肯定他“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这些当然都是应该肯定的，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点，即李白之功业理想实亦出于其生命需求与生活欲望，是其人性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李白之功业理想的内驱力。他所追求的功业最大化，实际就是人性的最大张扬。功业理想固然应该嘉许，但尚不是最本质的东西，而只是人性的载体，是实现人性的途径、工具。随着时代

的进步,这个载体、途径和工具是会发生改变的。比如,一个生活在现时代的有志之士,他的人生理想就不一定如一千多年前的李白那样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而可以是做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或企业家,等等。同样是希图人生有所作为,所图的内容变了,但人性没有变。李白希图人生大作为这种极度张扬的人性,千年之下,对今人仍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我曾记下这样一个例子:2005年11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家”节目中,科学家王选讲到他“文革”期间被打入另册时,一位叫马秉焜的同事背地里请他解决了一个关于“150机”的“纠错”问题,使他重新点燃了工作的热情,王选说,他当时记着李白的一句诗:“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二,在世俗的环境里,常人的人性往往遭受压抑和委屈,不肯或不敢说出来。这正如“李著”所说的:

我们在通常生活里,被压抑,被幽闭的已经太多。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的生命上之根本的机能和要求,本来是像汨汨的泉水似的,便也终不能一涌而出,却是日渐减削地为我们的理智,知识,机械生活,人事周旋,所毫无价值地雕琢殆尽了。

而李白不是这样,他能替我们把遭受压抑、委屈的人性需求说出来,而且是把“最要紧,最根本,最普遍”的要求说出来。他不受世俗的约束,没有人事的顾虑,甚至不经过理智的思考,他表达自己的人性需求时,只是一任真性的宣泄。比如,当他还没有出蜀的时候,到渝州干谒刺史李邕,写了著名的《上李邕》,自许为“抟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的实际内容,想来也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云云。而李邕对他一定有所规劝,结果引起青年李白的不快,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直接发泄对于李邕“压制人才”的不满,对刺史大人十分不恭。这在一

般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世人”二句所写的世俗态度，正是我们普通人的生命力被压抑、被幽闭而不自觉的情况，连大名士李邕也不例外。只有李白能冲破世俗的压迫和阻力，使其生命力“像汨汨的泉水似的”流淌出来。

李白在追求功业的过程中，得志时欣喜若狂，失意时悲愤莫名，正如“李著”所说“喜、喜的厉害，悲、悲的厉害”，感情的宣泄毫无顾忌，毫不掩饰。这种一吐为快的感情宣泄，乃是本着人性对于精神快慰、精神自由的追求。奉诏入朝之际，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得意之状，近乎忘形。入朝后，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中又写道：“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诗中情景固为写实，但炫耀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直到晚年回忆待诏翰林这段生活，他仍然陶醉其中：“汉家天子驰骝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或谓李白出朝后留下的只是痛苦的记忆，这是不尽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李长之所谓“喜的厉害”之事，李白终生实无过于此者。然而，在国人的道德信条中，对于个人得意之事是不应该特别炫耀的，否则，便会招来非议。终生可怜巴巴的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写《登科后》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两句是记实的，新科进士参加曲江“杏园宴”时，确有骑马探花之事（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但孟郊把它写下来，却招致了后人的抨击，宋人蔡正孙云：“其后登第，则志气充溢，一日之间，花皆看尽。进取得失，盖亦常事，

而东野器宇不宏，至于如此，何其鄙邪！”（《诗林广记》前集卷7引《唐宋遗事》）孟郊参加的是官方组织的集体活动，他不过如实地写下了内心一时感受，竟被鄙视，可见舆论之一般倾向。孟郊这件事，要和李白的自炫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同样的心思，孟郊说不得，李白却能痛快淋漓地说出来，李白实为孟郊和所有读书人的代言者。

至于抒写“喜”之反面的“悲”和“愁”，李白诗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应该更深刻、更强烈，如人们熟知的写愁、写悲的名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欲邀击筑悲歌吟，正值倾家无酒钱”、“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等，都把悲和愁推向了极致，推向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李白之悲、愁源于人生的失意，是他在追求功业理想受挫时内心痛苦感情的发泄，而痛苦的发泄也是一种人性的需要。这种发泄向更极端发展，便表现为狂，最著名的例子，是《江夏赠韦南陵冰》诗中的句子：“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发泄过后，他快意了，就又写了《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李著”引了诗中“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二句，说：“看他一写道‘一州笑我为狂客’的时候，多么得意，多么色飞眉舞，就因为这在他是到过瘾的事啊！”过瘾了，就是人性满足了。

二

如果说，功业理想寄托了李白的精神需求的话，那么，人的生命需求和生活欲望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现世人生的物质享受。“李著”在“导论”的“游侠”一节，引了《少年行》等诗，将李白身上的游侠思想与儒家思想对照，讲到了这个问题：

在这种游侠思想里是表现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和儒家精神又正好作一个对照了：儒家叫人要名，他这里偏说用不着名。儒家说富贵如浮云，他这里偏说只要眼前富贵。李白不甘于寂寞，所以像扬雄那样“白首太玄经”，他是不耐的；像儒家所赞美的原宪那样安贫乐道，他是不屑的。他要钱，要酒，所以是“十千五千旋沽酒”；他要女人，所以是“兰蕙相随喧妓女”；他要穿好的，所以是“浑身装束皆绮罗”……

“李著”见解的高明之处，在于讲到游侠思想所体现的人的物质欲望的时候，把他上升到了人的生命力的高度。它说：

唐代的中华民族，的确有一点生气。真像一个新兴的少年民族似的，颇有野性，换言之，就是很有生命力。这盛况尤以开元时代为最。……吸收与创造，物质建设与精神文明，武功与文艺，这似乎是相反的东西，然而其发达必是在同一个场合之下的，二者虽若相反，然而乃是息息相关，究极了说，乃是一种根本东西的不同表现的。……李白者，正是应运而生的一个时代产儿。人们之赞慕游侠思想之中，充满了活力，朝气，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

说到社会的发达，说到民族的生气，李长之先生居然能将“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并列起来，这与我们今天所努力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实有共通之处，换句话说，李长之先生的观点整整超前了六十年！物质与精神原本是共存的、相通的，有时甚至是难解难分的。比如，我们读李白《将进酒》，往往被诗中的名句所震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这些诗句写的是物质享受，然而，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却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受到的是巨大的精神鼓舞。物质与精神在李白诗中融为了一体，或者说，物质上升成了

精神！

三

为了彻底摆脱人生的痛苦，李白本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即如他在《梦游天姥吟》中所说的：“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就是彻底告别人世，归向自然，纵情于山水之间。李白是打心底里热爱自然的，他给自己设计的理想人生之路，是“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这里有先后之分，也有过程与归宿之分，说到底，两者都出自人性的需求，前者是要实现人生作为，后者是要追求最终的精神自由。然而，同为人性之需求，两者却是处于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既要实现人生作为，就得放弃，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精神自由；反过来，既要追求精神自由，就得放弃人生作为、起码是不指望有大作为。但李白却两头都不放弃；非但不放弃，还要两头都追求“最大化”。这样一来，李白就终生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关于李白的痛苦，“李著”在结尾处说了这样两段话：

李白的痛苦是一种超人的痛苦，因为要特别，要优待，结果便没有群，没有人，只有寂寞的哀感而已了；李白的痛苦也是一种永久的痛苦，因为他要求的是现世，而现世绝不会让人牢牢的把握，这种痛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脱却的，这种痛苦乃是应当先李白而存在，后李白而不灭的，正是李白所谓“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愁是万古无已的了。

根本看着现世不好的人，好办；在现世里要求不大的人好办；然而李白却都不然，在他，现世实在太好了，要求呢，又非大量不能满足；总之，他是太人间了，他的痛苦也便是人间的永久的痛苦！

类似于李白的、与李白在本质上相通的人间痛苦，我们也曾

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好在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在现世里要求不大的人”,所以我们不至于承受李白那样的大痛苦。但我们在日常的、平凡的事业与前途的追求中,仍不免遇到诸如坚持与放弃、前进与后退之类的矛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许能从李白那里得到一丝自慰:李白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经历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痛苦,实为人生所难免。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实不可企望毫无缺憾的完美人性的实现。

四

在人生的大追求、大痛苦之外,为了写下李白“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李著”还以较短的一个专节,写了“李白的情感生活”。其实,不用说,这是人性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李著”在这里只涉及了爱情与父子感情两个具体问题。关于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李著”本着道教主张自然、强调物质的观念,突出了李白诗歌的两个特点,一是“重感官”,一是“真”。它举了李白一些描写爱情、或者曰女性的诗句,认为李白写得具体,写得露骨,即重感官,但又认为“这些都毫没有关系,我们也毫不觉得鄙近,也毫不觉得恶俗,这就是因为,过分与急切是李白的本色,写到本色,就是真。‘真’便可以原谅了一切了。”暂且丢开“李著”所举的诗例,我想说的是,李白描写爱情的诗,在唐诗中其实是第一流的。比如,在我们的汉语语汇中,表现美好爱情之最佳的,莫过于“青梅竹马”一词,而这个无比美好的词正是李白在《长干行》中创造的。千百年来,人们最欣赏的爱情模式,是“郎才女貌”,这也是最人性化的爱情标准。古今诗人中,谁曾赞美过这种爱情标准呢?是李白。他在《代别情人》诗中写道:

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

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风吹绿琴去,曲度双鸳鸯。……

“我悦”二句，难道不是对“郎才女貌”最诗意化的解释吗？李白诗中还写下了那个时代城市生活中十分开放的男女交往情景，试读其《陌上赠美人》：

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4〕}

美人一笑褰朱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先是青年男子的主动，接着是美人的主动，双方都热情大方，但又不轻佻，不失风度，充满健康的人性之美，充满现实生活的诱惑力。

讲到亲子之情，“李著”征引了李白怀念小儿女的几首诗，然后，动情地发为感慨：

在一般目李白为狂人，为不近于人情的人，在这里要反省的罢，漂泊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狂歌度日的李白，他却是有着一颗多末与通常人逼近的，相通的心！

李白这些诗一改往日的飞扬跋扈，委实写得柔情百结，肝肠寸断，比如，“李著”引了这样一些诗句：“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李长之说：“这便都是在别了他的爱子们三年以后写的了，那印象更多末具体，字句更多末给人刺戟！”事实上，这里最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当时李白的许氏夫人已经去世，李白出门远游，留在东鲁家中的是两个没娘的孩子，所以李白才有“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的伤感！

读了“李白的情感生活”这一节，我们会对诗人李白平添许多理解，平添许多亲近感。“李著”曾有“人间味极浓厚的李白”的说法，换句话说，也就是人性味极浓厚的李白。李白被视为疯子、狂人，他确有疯子、狂人的一面，但同时，从人性之本质说，李